

论政策失效与通货紧缩惯性的制度变迁背景^{*}

李 京

(厦门大学 财金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所要论述的问题不是通货紧缩为何发生,而是在众多的相机抉择措施出台之后,通货紧缩为何仍在继续。分析经济运行的惯性要求我们从把握经济体制变革的方向和趋势入手,也即必须深刻认识经济运行态势背后的制度变迁痕迹。为此,试图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去阐释中国通货紧缩惯性。

关键词: 制度变迁; 通货紧缩; 预期

中图分类号: 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585(2000)06-0030-04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the Policy Failure and the persistent Current Deflation

Li Jing

(Finance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oes not concern the reasons for the current deflation, but the causes for the deflation persistence in the face of the anti-deflation policie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tendency in economy requires us to set out grasping the direction and trend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al changes, i. e. we must initiate our research by looking into the economic background of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For this reason, the author makes an effort to explain China's current deflation persistence with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change; current deflation; expectation

一、引言

已有诸多文献就中国二三年来宏观经济层面上出现的物价持续下跌的现象的起因进行了广泛而多角度的讨论。就其所采用的分析工具而言,绝大多数文章的论证逻辑都构筑在传统总供给与总需求分析的理论框架之内。其论证的角度或侧重于总需求分析,或总供给分析,或二者并重。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谢平,余永定,周天勇 1999)则必然是按照这种分析理念得出的自然而然对现实经济态势有较强说服力的思路总结。

本文的写作目的不在于对中国的通货紧缩为什么发生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而是重点剖析把通货紧缩的长期持续(即通货紧缩惯性)与政府政策相对失效联系起来的中国制度变迁背景。产生这样的写作宗旨基于笔者注意到以下的事实:既有的分析思路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对经济表层运行的描述,而对隐藏在其背后的制度变迁因素的原始推动作用认识不足,由此认识上的缺陷与遗漏难免使其得出的结论停留于表面与感性。进而开出的医治经济顽疾的处方也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之嫌。因此下文将着重探讨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与以往经济变迁轨迹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并找到暗含在这种联系中的制度变迁支撑点,进而深化对国家反通货紧缩政策理论与实际的绩效存在差距的认识。文章的基本思路是先概述改革以来经济制度变迁轮廓(其中重点分析产权布局的调整),随后将通货紧缩惯性纳入到制度变迁背景中去进行考察。

* 收稿日期: 2000-04-03

作者简介: 李京(1975-),男,四川宜宾人,厦门大学财金系金融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研究。

二、制度变迁:过去和现在

欲分析制度变迁我们就不能回避国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对于处在转轨过程的中国经济而言,国家的偏好与机会成本的改变对于制度变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正如同诺思(1981)所说“在任何关于长期的经济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一席。因为国家的存在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为了提高已有的制度经济学结晶对中国经济运行特殊性的解释能力,不少学者对经典国家模型的假设作出了必要的补充和修正,在这其中,张杰(1998)所作的扩展性解释似乎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而其所作的修订无非是要说明,在中国国家按垄断性原则设计和实现满足自身效用函数的产权结构的能力较之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要更加强大。提出这一假设,才能保证随后得出的有关中国经济制度二重结构以及中国经济制度的演进轨迹的结论,有个牢固的理论基础和贴近中国实际的分析出发点。

过去的中国经济发展轨迹被解释为主要是单一的国家偏好追求租金最大化的结果。国家根据其效用目标函数中的成本、收益等变量,在既定的策略集中选择能最大实现其租金收入的经济产权结构和宏观经济发展路径,并不断依据约束变量的变化对发展路径与产权结构作出适时的调整。由此我们才看到自20世纪50年代国有化改造开始,直到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止这一长达50年的时间跨度内中国经济的演进轨迹。而现在,我们不得不再次修改关于国家模型所作出的假设:如果说在以往的经济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唱“独角戏”的话,由于改革20年以来多种产权形式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当今的中国经济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具备足够谈判能力的中下层势力(这些势力包括地方政府,非国有经济以及普通居民等)。国家对整个经济的控制能力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下降,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由国家偏好的单极引导向多方力量的交易均衡的重要质变。在这样的改革背景下,通货紧缩惯性的出现便有了更多的内生依据,可以更大程度上被看作是来自下层结构的对于国家政策安排的反作用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的表现。

其他产权形式的兴起与国家产权退让恰似一枚硬币的两面。欲推究非国有产权形式的发展,则必须先理解国家选择推出所依赖的策略空间。大量研究表明,建立在国家垄断产权基础上的工业化过程是难以持久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国家效用函数代替企业的效用函数将使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设计及实现中支付极高的信息成本,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张杰1998)。正是高昂的交易费用约束移动了国家进行决策时所面临的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曲线。使得国有垄断在决策人的策略空间中逐步失去优势。国家在其制造的国有产权形式主导了20余年的低效经济增长之后,最终被迫宣布退让(这种退出虽说是局部的退出,但其影响和后果却是全局性的)。这一退出策略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设计思想上(例如“抓大放小”)体现得十分突出。

另一方面长期被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禁锢着的下层结构的经济自由得到了释放,这种经济自由蕴涵着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与激励。而要使这种增长潜能与改革激励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贡献与产权布局调整,一个稳定而有力的中间机构所提供的制度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看到,在伴随国有产权退出与非国有产权扩展的同时,中间机构的发展步伐也得到了及时的跟进。这体现在法律制度的完善,产权布局的明确以及市场类型的丰富等等一系列有助于在传统的二重结构中插入缓冲地带的因素的壮大。中间势力的强大使得国家由过去的直接控制下层结构转而依赖于中间机构间接控制下层结构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如宏观经济间接调控的实施),进而国家与下层结构之间的契约关系与产权保护关系得到确定,经济增长也就相应转变为国家与诸多产权形式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合成结果。

既然经济发展已不再是国家的单极推动而是由多极在相互磨合的过程中形成均势的结果,这就注定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必将表现出与过去有所不同的特征与绩效,由于国家与下层结构具有不同的偏好与比较优势,因此二者在新的经济运行图景中所承担的份额大小与性质也必有所不同:一方面国家职能向公共财政转化,另一方面经济的实质发展则更多地来自微观经济单位的推动。而正是二者职能的异化使得实体经济的运行出现脱离政策意图的趋势成为可能。近年来政府针对通

货紧缩所采取的多项措施收效甚微已初步验证了这种趋势的存在。

三、通货紧缩惯性的制度变迁背景

以上仅仅论证了在国家——中间机构——下层产权形式这样一种三重制度结构中出现经济运转与政策设计的偏差以及政府在这种内生偏差面前处于被动地位的可能性。而就通货紧缩这样一种确已发生的偏差而言,除了证明其可能性以外,我们还应深入考察通货紧缩发生的外生诱因与使其得以持续的内生机制。

我们注意到位于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拐点上的几起事件。尽管常识告诉我们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并不等价于因果关系,但对这几起事件的详细研究能够有助于我们找准思路的起点。如果能找到这几起外生事件对宏观经济所具有的共同影响模式,则我们不能排除在前后事件之间建立因果联系的可能性。事实证明,我们确实找到了这种联系。

正如多数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也把经济“软着陆”政策、东南亚金融危机、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多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列入到外生事件之列。事实上换个角度来看,这些外生事件又多半具有内生的性质。拿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来说,其行进过程中会带来风险与成本,这点决策者应该十分清楚。但在国家理性的前提假设下,当国家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竞争背景中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实乃被迫之举。只有对国有板块动大手术,国家方才能够日后与不断壮大的其他产权形式的谈判中更好地谋求租金极值。因此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决策并不是国家的单方面主观判断,而是国家基于现实对未来的充分考虑。那么这些外生事件对宏观经济的共同影响模式是什么?而这些影响模式得以维持,与之相呼应的经济内生机制又是什么呢?国家刺激需求政策的相对失效为我们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提供了暗示。

让我们分两个层次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如果这种影响模式是外生事件的发生单纯减少或抑制了总需求的话,理论上由国家出台扩张需求的政策应该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经济萧条的长时期维持告诉我们外生事件的影响模式并不全是数量性质的,而且这种作用途径带有不容易逆转的特点。而有此特征者非心理预期莫属。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对人们的主观行为与其经济后果的考察之中提炼出预期这个关键变量,从而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架起了相互沟通的桥梁。按照预期理论的说法,人们对于未来的估测与期望会相当程度上左右他们当前的行为模式。预期会决定居民消费多少,厂商投资多少以及银行贷款多少等等,可以说,只要是存在决策的场合,我们便会发现预期这个因素的作用痕迹。预期的这种对国民经济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正好能部分解释为何通货紧缩得以长时间的持续。只要形成负面预期的因素(重点是影响居民的收支预期和厂商对经济前景看法的因素)不消除,宏观经济就很难在短时期内止跌反弹。注意到预期的作用应该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紧接着要解决的问题是,难道在以往的经济生活中人们就不会形成预期吗?如果也存在,为什么预期的作用效力远不如现在条件下这样明显?由此对同一条件在不同制度背景下结果的前后比较把我们的思路引向了问题的第二个层次,也即制度层面。

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粗略勾勒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总体脉络,如果要用一句话加以概括,我们可以归纳为国家在产权布局中的退出趋势伴随下层结构与中间机构的替代补充。在既有的经济总体布局中,一场使权力重心由国家移向中下结构的变革正在悄悄进行。而正是这种权力的转移为中下层结构的预期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使得过去的不可能成为今日的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尤其重要。改革是一场权力与权益的再分配。尽管国家会从制度变革前后的对比中察觉出对经济要素控制的弱化,从而萌发阻挠变迁继续的内在需求,但此时的制度演进已不再是处于国家的单极操纵之下,而是多方力量寻求新的均势的合成结果。只要来自中下层的竞争压力还在增强,新一轮的讨价还价和格局再划分将无法避免。由于预期作用的大小与“理性人”所拥有的权力指数的大小成正相关关系,这也意味着预期将在日后的经济生活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政府在进行政策设计时也要更多地考虑到预期对政策效果的消极影响。

在比较一下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阶段上政府政策的效力之后,我们便会深刻体会制度变迁对经济政

策的有效实施所具备的特殊含义。这里为了突出重点,我们暂不考虑其他因素,而集中精力于对预期作用的前后比较(这种简化不会影响问题的实质分析)。这是因为预期要素最能反映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国家与中下层结构的权力消长,以及由此权力布局调整所导致的中下层对上层政策的不同反应能力。

在改革初期,有经济学者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来形容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站在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一抓就死”反映了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强力控制,只要认为有必要,国家就会而且有能力动用各种手段(行政命令,经济措施)保证经济运行与其认定的理想状态保持高度一致。而“一放就乱”则体现了下层结构有关自身发展的愿望在政策松动后的复归。虽说如此,在国家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对比格局中,国家对于经济的主观设计和控制仍是贯穿于当时经济历程的主旋律,此时并无中下层的预期这个反馈要素的活动场地。

具体一点,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通货紧缩发生在制度变迁的早期(事实上经济衰退已经发生过几次),国家会采取的相应对策及其绩效。理所当然,扩大货币供应量会成为政府的政策首选,因为政府会发现,增加了的基础货币投放确实能被灌输到实体经济中去。那时信贷规模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政策工具,而通过“密切配合”的专业银行的政策传导,下层结构总会迫不及待地把刚刚到手的信贷资金投入再生产领域,以此单靠货币投放这一途径政府就会迅速启动低迷的国民经济,这在中国的改革历程中并非没有成功的先例。

而现实情况却是,迫于粗放的直接控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权力指数的下降,中央银行不得不放弃熟悉的计划调节而启用陌生的间接调控手段,而後者的成功运用又离不开一国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媒介支持。对于央行来说不幸的是,一方面自己尚不具备充分的市场经济间接调控的经验与能力,另一方面此时的商业银行系统已今非昔比,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目标效用函数,并且具备了相当的与监管当局进行周旋的能力,但凡与其利益相冲突的政策措施经其传导似乎都会“缩水”(如“惜贷”现象的出现)。问题还不止于此,对于央行货币政策的绩效构成更大威胁的因素往往来自实体经济的反应,而今日的实体经济仿佛掌握在较之过去更加符合经典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手中,想要影响他们的决策行为,政府会发现预期的渗入加大了政策实施的难度。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国家还是下层结构,其行为宗旨都是符合理性假定的,发生改变的不过是下层结构实现其理性愿望的外部环境和自身权力禀赋。一般说来,源自不同偏好的下层结构的理性选择难免会与政府意图发生碰撞,而在新的产权安排制度下,这种碰撞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它在此次反通货紧缩政策博弈的表现形式即是,任你中央银行采取何种政策(利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提供消费信贷等等),居民就是不增加消费,厂商也不扩展其投资规模。所有这些现象都是中下结构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向的预期尚未发生根本逆转的表现。

四、结束语

由于在总体产权布局中国家与中下结构所占份额发生了变化,中下层结构开始享有了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国家对制度的外在供给正在让位于中下层对制度变革的内在需求。在此过程中,国家对实体经济的控制能力正在下降,而当国家试图加以重新控制时,却已发现力不从心。来自中下层的反作用有力地抗衡了国家政策目标的实现。此次针对通货紧缩的政策措施收效甚微,从而使得通货紧缩得以长时间延续即是明证。预期,这个过去被忽视而现在变得尤为重要的因素,只不过是这种自下而上反作用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参考文献:

- [1] 张杰. 中国国有金融体制变迁分析[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 [2] 张杰. 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M]. 太原:山西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 [3] 诺思. 产权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4] Blau, Peter M,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 Inc. 1964.
- [5] Parsons, T. & Shils, E.,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责任编辑:刘玉屏